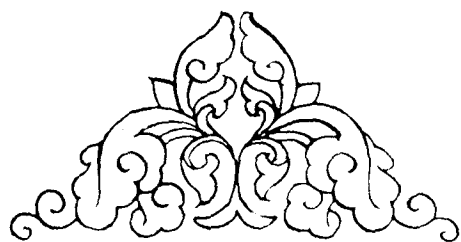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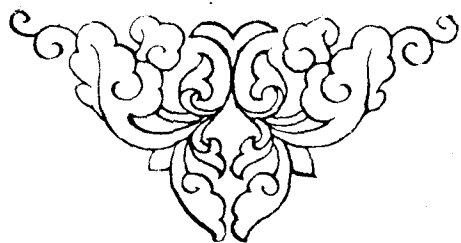




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孙 毓 棠 学 术 论 文 集



孙毓棠学朮论文集

孙毓棠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赵仲兰

~~孙毓棠文学文集~~

孙毓棠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8½ 印张·43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25.00元

ISBN 7-101-00508-X/K·223

目 录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之趋势·····	1
战国时代的农业与农民·····	14
汉代的农民·····	34
两汉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	49
汉初货币官铸制之成立·····	117
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	127
汉代的太常·····	257
西汉的兵制·····	268
东汉兵制的演变·····	328
汉代的交通·····	356
汉与匈奴西域东北及南方诸民族的关系·····	373
条支·····	385
安息与乌弋山离·····	392
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415
隋唐时期的中非交通关系·····	436
汉末魏晋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动荡·····	450
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	502
清初土地分配不均的一个实例·····	553
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	558

晚清江西纸厂工人反压迫的斗争 575

整理后记 吴树平 581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之趋势

中国的历史从商代起才透露出一点光明,但因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那时的社会组织仍是茫然。我们只知道商代末叶黄河中下流域的经济生产,已脱离采集游牧的阶段而进入了相当兴盛的农业时代;政治上由族团部落已进化成为统一的王国。这王国的领域并不大,四周被许多部落式的异族方国所环绕。这些方国虽也有被征服的和称侯的,但与商人的关系似很松弛。商人的生产组织已杳不可考。虽有奴隶,但决非以奴隶为主要生产的劳动者。贵族与庶民虽有阶级之分,但封建的色彩恐还不甚浓厚。

当商民族文化已入成熟期的时期,西方渭水流域突起了周民族。在元前十二世纪周人已进入了兴盛的农业经济时代。元前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渐渐扩充势力,统一了渭水流域,急欲东进;至其末叶竟以武力灭了殷国。周人在灭殷以前,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因素,如长子继承的宗法,族戚分封的采邑,克服新土的建藩,及庶民耕地贵族当兵的社会分工等,都已形成。迨至灭殷以后,便把全部封建制度移植到东方,作为治理新土的唯一的原则。周的灭殷把整个文化世界改了个新局面,对于这新局面的处理,在周人看来舍封建别无他法。封建是周人唯一的政治社会观念。尽管文化方面周人大部分承继了商人,但政治社会的组织却是周人克服了商人。东方民族不甘于此,不久便发动了叛乱,周公乃二次再平东方。这第二次的东伐意义很重大,他不仅表示西方封建政治国家的胜利,给以后数百年历史奠定了基础,而且兵力直达到海滨,黄

河流域遂统一于一个富有封建观念的征服者之下。从此中原文化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活，便都随了这个观念向前进展。封建主义虽是周人的贡献，却不是周人意识的产物，乃是族团部落社会组织与农业经济结合演进所成的自然的结果。

周公以后社会便在封建的大道上向前进展。大致说起来，自元前一千年至元前五百年（春秋末叶）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封建社会的基础第一是土地的分封。简陋的农业生活与薄弱的统治能力，使没有帝国组织观念的周人，对此新征服的广大的领域不得不依传统的习惯实行封藩，同时他们也深信这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政治原则，因此便把土地分封给若干同姓的诸侯。诸侯们也本诸同一的原则，封土多时即再分封与卿大夫士。名义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土地人民的治理权分成为无数层叠的小单位；臣对君只有一种尽忠履信的空洞的义务，在他自己的封土上却享有十足的政治经济法律及自卫的权利。第二是农业劳动之特殊的组织。封建的观念使土地与庶民均为贵族所有，庶民绝对没有自由，等于农奴。贵族只把土地授与庶民，收取其一部分的生产所得，曰私田；保留一些土地令庶民代己耕种，收取其全部所得，曰公田；公田散布于私田之中，平原上阡陌分画方形，故曰井田。山林川泽都是贵族的私产。耕地授自贵族，故不得买卖。庶民是被治而食人者，贵族是治人而食于人者。第三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活。每个采邑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供给人，也无求于人。制造只有农村的小手工业，商业交换也仅以小小的农村市场为限。另外在贵族的官中也有工人商人，都仅为贵族而制造贩输，等于仆役，此之谓“工商食官”。因为采邑的农业虽简陋而仍能自足，工商业便没有独立的活动，而交换也只有小规模以物易物，货币绝少流通。第四是阶级与秩序。在政治主权极端分散的情况下，只有阶级制

度可以维持社会的安宁。统治阶级的贵族以系统的宗法，实行对庶民的治理，并用充分的武力来维持阶级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存在，庶民则只有忍受。因要维护这阶级制度使其尊卑不紊，遂产生了诸般繁缛的“礼”，和维护此阶级制度与“礼”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组织与经济生活的简陋，使封建时代不得不成为如此一种不平等的社会。

封建社会是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在别种政治制度产生以前，只有它可以暂时维持社会的秩序。在这秩序中，文化乃有发展的可能。封建社会在那时对于文化并非一种进步的阻碍；因其能暂时维持安宁与秩序，反有助于文化的进步。封建时代文化的前进是很显明的。在西周初年，灭殷不久，商文化被摧残了而周人的学习尚未成熟，一般文化比较低落。王室忙于巩固自己的威势，诸侯忙于开辟发展，整个时代在发展动荡中，是个奠基尚武的时代。到了西周后半期，中原均已平定，文化的进展也趋于典章制度礼乐祭祀等尚文的方面。虽然宣王时曾一度打算以武力恢复王室的威风；虽然此时期王室备受戎狄的压迫，终于不得已而东迁；虽然自中叶以后四方强大的诸侯实力渐已长成，终于在东迁（元前七七〇年）以后势凌王室而过之；但此时期的文化确比初期进步得多。迨至进入春秋时代以后，使封建制度瓦解崩溃的种种社会经济的因素都还未成熟，以“礼”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以及物质文明的急进，在春秋时代中弥漫隆盛到了一种烂熟的阶段。到后来封建社会虽已崩溃，这种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却遗留了下来，成了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原素。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便崩溃了。在我们讨论崩溃过程以前，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我们当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始终没有一个静止的时期，这五百年社会间的一切永远在

演变动荡中。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及其观念的发展，本出自一个简单的源泉，但随了时间的发展，滚荡成千支万流，触及当时人们的一切生活。同时，在封建初期，崩溃的因素即已种下了根芽，它随了封建文化的发展而成长，时间愈久，崩溃的因素也愈成熟。等到封建时代到了文化的烂熟期，封建的基础则早已动摇，封建只剩了一个文采斑斓的空躯壳了。所以我们没有法子说封建社会是何时完成何时崩溃的，他是一面在完成着一面在崩溃着。其次我们当注意中国封建的发展有地域的分别。在这封建时代的五百年间，有些地方封建色彩极浓，如晋及宋郑鲁卫等；有的地方较淡，如楚；有的地方简直不曾受到多少传染，如秦与吴越；又有的地方曾一度想摆脱而未成功，如齐。这种地域的区别对于后代历史的发展关系极大，是一个不可漠视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发展不平衡而又时时在变动的社会，不是一个静止的时代、组织，或系统。

封建社会的崩溃是一个长久而复杂的过程，各种因素不是同时进行的。不过一直到了春秋末叶及战国初年，各种因素才混合成熟，使崩溃的速度急转直下。春秋战国之交是一个变动极大又极重要的时代，不幸史料却极其缺乏。我们只知道战国年间许多现象与春秋以前绝对不同，但其衍变的详细过程已杳不可考。我们只能根据一鳞半爪的材料推想其大概。目下有五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出崩溃的痕迹。第一，阶级的破坏。封建社会的基础全赖阶级制度来维持，王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隶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不动摇，则封建制度才得存在。以“礼”为中心的封建文化进展之目的即在维护此阶级制度。但阶级制度之难以维持，自西周中叶已露了苗芽。恭王以后王室便有不能驾驭诸侯的趋势。西周末王室之衰，主因即在此。春秋霸权兴起，王室威望扫地，而卿大夫上凌

诸侯的新运动则亦萌芽。春秋中叶可以说是世族全盛时代，迨至末叶则陪臣竟又上凌世族。同时平民渐得参政，而贵族则沦落为庶民奴隶的事也渐次加多。孔子悲叹名不正，下犯上，正是悲叹阶级制度的破坏；孔子的崇“礼”正表示“礼”之不再能维持阶级制度。即在孔子时代，列国的农民动乱更足表示阶级制度只剩了一个空壳，庶民的抬头是想推翻一切封建的阶级观念。第二，春秋二百餘年间物质生产的进步促成了工商业独立的发展。封建末叶社会中先产生了自由的商业买卖。工业农业技术的进步，地域生产交换的需要，因战争而发达的道路与交通工具，都使商人的活动范围扩大。贵族为了奢泰生活的需要，鼓励商人自由活动。列国金属货币的运用使商业染上了资本性。最初商品只是奢侈品，后来工业生产都渐渐商品化了。商业的发达使城市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战国初年务商已被视为一种厚生致富之道，很多下级贵族与上级庶民都舍农耕而务商。商业发达刺激了工业生产，小手工业渐渐脱离了官府农村而入城市独立发展，且有几种工业已有走向大规模资本式的生产之趋势。于是封建经济整个起了革命。第三，土地的所有权渐渐转移。自春秋中叶以降，中原一带先取消了受田代耕种，改为“税亩”，农民的献纳改为租赋。这种新制度使得封建贵族与庶民之间改变了关系，诸侯们成了新政府的君主，大夫士成了地主，而一般农民则自农奴的身份解放而成为佃农与自耕农，他们渐次获得了生活的自由，工作的意志，与土地所有权。土地已不再是神圣的封土，而渐渐可以自由转手买卖。贵族的没落迫使他们出卖土地，购买土地的正是庶民。庶民有了职业的自由，他可以作自耕农，也可以改业务工商学仕。庶民的解放与土地的灵卖在那二百年间慢慢的进行着。迨至元前四世纪，李悝商鞅这一派的法家出头后，不过是想在法律上承认並法定这种已成的事实而

已,土地制度的革新摇动了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基础。第四,贵族阶级本身也起了变化。在封建初期,贵族,特别是下级的“士”,负有保护庶民维持治安的责任,只有他们能当武士,也只有他们是武士,少数的庶民奴隶(徒)在战场上不过附随而已。迨至文化进步,这些贵族阶级的“士”也渐染文风;而战争规模的扩大使步兵渐渐重要,封建军队中庶人因亦加多,且占了主要地位。至春秋末年,“士”已大半变成了文士,失掉固有武士的意义,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一部分仕为官吏,便成了后代所说的上中下士;一部分致学(学最初本是贵族武士教育,但随封建文化的进步,后转成文士之学),便成了战国年间的学人;一部分货殖,抛弃了小贵族的地位竟成了城市里的工商业家;又一部分爱生产作业,竟投资土地成了地主。这是封建统治者自己的摆脱封建。第五,列国关系与政治观念的转变。封建初期,藩国类似星罗棋布的城邦,各自忙于开辟和扩张,没有显明的势力冲突。迨至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列国疆土渐渐接触,在势力发展时自然引起斗争。春秋初年斗争的目的只在尊王攘夷维持秩序和保卫小国,仗义为霸。封建的观念极浓。到了春秋末叶,封建主义已渐渐失落其为最高政治原则的地位,列国都产生了土地人民的占有慾,政治主权也渐次趋于集中。吴越的陡强益发加速了这种趋势,推翻了封建政治观念。一入战国时代,列国为了生存自卫,全力集中于富国强兵,战争的目的由争霸而变为土地资源的侵略占有,野心更大的乃提出“王天下”的理想。战争遂成为生死之争,军国主义的政治观念代替了旧的封建政治观念。因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列国关系上这种新的潮流是推翻封建制度的一种极大的力量。

在春秋战国之交,以上所说的这几种潮流鼓荡会合,遂把整个社会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变动时

代。这种变动给与时人的心灵与精神以极深的刺激，使人们对于宇宙人生政治社会开始运用独立自由的思考。独立自由的思考与活动促成了“个人”的出现。这种“个人”的新精神正是这封建崩溃后新社会的最重大而深刻的表现。

封建崩溃的新潮流把战国二百余年激动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极迅速的时代。自战国初叶以来，铁制农具的使用渐渐普遍，种植乃由耦犂进为深耕，纍田进为条播。灌溉技术较前大发达，列国政府都假此大规模地开辟荒地。肥料的使用，土质的辨别，对时节知识的增加，园艺的兴盛，都使农业技术突飞猛进。封建采邑的衰溃与小地主自耕农的兴起是促成农业进步的主要原因，但列国因企图富国强兵，鼓励农业生产，“尽地力之教”与“耕战”一类的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很大的助力。农业进步增高了土地的价值，同时又因商业的发达，农产物遂亦商品化，于是土地兼并之风逐渐兴起；不过战国时代的土地分配实际上还远较汉代平均。虽然佃农雇佣两种人已日益增多，但社会的中坚分子仍是小地主自耕农。这些自封建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农民虽已得到了自由，可是对政府的赋役负担仍然很重。在列国纷争之下，统治者的问题全在如何同时充分地鼓励农民生产，又如何充分地役使农民，协调这两件事是很不容易的。此外，战国时代最明显的发展是工商业。商业最初发达于齐鲁韩魏及中原区，以后渐及燕赵吴楚，秦国怕是最落后的。交通的发达减少了商业活动的许多阻碍。列国政府的鼓励自由商业，使商人不仅得到十足的自由，而且负担比一般农民低得多。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时代，政府不想干涉更不会统制。商人们活跃享乐于都市，使得都市骤然发达。例如临菑，人口便已超过三十万；此外人口五万以上的都市并不罕见。金属货币的使用与商业的兴盛互为因果，当时“黄金”，魏布，齐刀，与晚周的钱

货,大量地流通于各国。商业的活跃与货币经济的开展,使战国年间的工商业很快地便走向资本集中的路。同时,借贷事业也发达起来,其影响不仅限于商界,并且深入了农村。列国地域不同的出产固然促使商业活动规模日大,而战国又是个积极向外发展的时代,被征服的文化较低的地方都成了良好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同样影响了工业发展,列国政府并不干涉工业家的活动。城市手工业进步得极快,分工也相当细密,尤其以纺织、食用具、车马具、装饰品等为最发达。而煮盐冶铁两种工业,因为制造规模较大和所需财力人力较多,自战国中叶以后便成了资本式的生产,以盐铁致富的大资本家都富埒王侯了。这新兴的工商业阶级虽饱受儒家的贬斥,但并没有受多大影响。这种工商业急速的发展与农业技术的改善使得战国时代的物质文明进步很大。封建时代的发展是由武而文,人们企羡的是“贵”;战国时代的发展是由文而奢,人们企羡的是“富”。

以上所说的经济发展促成了封建的崩溃,而封建的衰溃又促成了经济急速的发展。不过社会的变迁是复杂而迟缓的,新潮流在奔腾前进时,旧潮流却也在挣扎图存中。两种势力相搏,社会便呈现出极端的动荡与不安。战国时代即是如此的一个时代,一方面新社会在建成中,一方面封建残馀的势力习俗观念与理论却依然存在,双方各有其拥护者。社会的混乱与动荡,表现于思想方面,即是诸子百家之说,而真能代表这新旧两势力之倾轧的,简单的讲,即是儒家与法家。儒家思想昌盛于封建传统最深的齐鲁区域,法家的主张则只有封建传统最薄弱的秦国最容易接受。社会的混乱与列国的纷争促使一般农民、工商、思想家,与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共同企望着和平秩序与大一统,这正适合政治上“一天下”的理想;而当时的经济环境实早已给一统打好了根基。谈统一天

下，列国之中只有彻底推行法治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秦国有此能力。这统一的事业，到了元前二二一年终于完成了。不过，秦始皇的统一基础虽已稳固，但政策失之过激，他想把治理秦国成功的传统的秦式法治主义推广以统治天下，结果终归失败。残余的封建观念尚存在而同时又享受着自由的东方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极端的法治主义，此为秦末革命的主因。革命在表面上虽要恢复六国，但革命所引起的战乱不久便使一般人益发企望更根本的和平秩序与一统。汉初似封建而又一统的局面即在此矛盾的心理上推衍成形的。

这种矛盾并没有多大的妨害。汉初的社会大体上讲虽仍是战国的形态，但经过战国二百余年的发展，新社会已渐渐成熟又稳定了下来；残余的封建制度，经过秦代一度积极的斩除，已不复存在。遗留到汉初的只剩了一团空洞的封建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所复兴的不是已死的旧式封建，而仅是一种“家天下”主义同姓分封的新型的封建。所以封建在汉初七十年间已不是社会问题，而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因为阻碍了帝国的统一，所以也间接影响到社会的不能彻底安定；但自吴楚七国之乱平后，又经汉武帝时左官附益之法的颁定与推恩令的实行，最后的封建残影终于消灭。我们可以说自战国以来鼓荡了三百余年的封建余波，本已日渐衰微，最后到了汉武帝时代遂完全灭绝。从此以后，中国的社会便凝固成了一个新形态，这新形态的社会是从封建社会渐次崩溃以来，动荡了三百余年的长时间，才得完全成熟又稳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了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坚定的基础。这稳定以后的新社会，因其有种种特色，我想可以暂名之为两汉形态的社会。

所谓两汉形态的社会，大致说来始自元前二世纪中叶至元后二世纪末叶，这三百余年没有十分激烈的变动。这个社会仍以

农业为基础，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中以五口之家“治田百亩”的自耕农占大多数。这种“小农”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除了得应政府相当重的力役兵役征敛外，向政府交纳的田租算赋口赋更赋约共占其每年农田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全家最低的生活费用约占其百分之七十五。为了此种生活压迫，他们在节衣缩食之外，不得不努力发展农村副业，特别是纺织、园圃、豢养家畜与农村小手工业，汉代农村工业的发达此为主因。但他们的生活到底还是常在破产的边沿上，一遇到天灾兵祸贪吏豪强便易典田卖子，沦为佃佣游民奴婢或盗贼。不过汉政府对此问题的救济尚比较尽力，且很收效。汉代在中国农业史上是一个极光明的时代。大约到战国晚年才起始的铁犁与牛耕，经汉武帝时赵过的改革，大有进步；他所发明的代田法也渐推行于农业兴盛区；到西汉末又发明了区田法（点播）。这种技术进步使汉代农田的产量比战国时几乎增多一倍。灌溉与肥料都更进步。并且大规模荒田的开辟与农业技术一般的普遍化（特别在江南）是很惊人的。农业的急进虽使经济生活向上，但土地分配却发生了问题。自战国以来兴起的兼并之风，至汉初还没有发生显著的灵征，但到了元前一世纪便日甚一日，据有三四万亩农田的大地主已不罕见，最高有到二十万亩的。兼并者是官僚、商人与地主。这种土地权的集中在社会上逐渐发生了影响，许多自耕农被迫沦为佃户以及佃佣游民或奴婢。汉代田租本不算重，只取农产三十分之一，但大地主把土地分“假”与佃农，租酬甚至高到十分之五。政府收入之薄，佃农生活之苦及大地主得利之厚可以想见。时人对土地问题几次图谋改革，但都未成功。到了东汉巾叶以后兼并之风更盛，遂引起社会上极度不安，政府不谋限制，这是汉帝国终于崩溃的主因之一。

社会的最下层是官私奴婢，但在整个社会中比较不甚重要。他们仅占全人口百分之一二，而且有一小部分参加农工生产，大部分是在贵族官僚富人家中任仆役。汉代蓄奴之风比较盛，富贵人家有多到数百乃至一两千的，即便是小农家有时也养一二奴婢，因奴婢价格不太高。奴婢在社会及法律上的地位虽低，但有时得主人优养，生活比小农还舒适得多。汉人阶级观念并不严格，富贵阶级和平民因犯罪破产而降为奴婢，及奴婢为主人宠顾而升为平民甚至贵族官僚的事并不少见。

汉初太平了六七十年，工商业仍沿着战国以来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急速发展，资本势力的活跃渐使社会感觉失了平衡。政府虽极力想重农抑商，但仍不能制止都市人口的增加与富商大贾及盐铁家资本的积累。直到汉武帝时因对外征伐财政困难，才起用桑弘羊等来推行一种新政策，把盐铁和大工业收归国有，提高了工商税，官办均输平准以抑商，又开卖爵卖复以吸收游资，政府统一了铸币权，稳定了币价格。经过这次改革，国家财政每年收入自七十万万增至二万万，不过工商业一时受了很严重的打击。自武帝至东汉和帝这二百年间可以说是政府推行统制经济时代，资本势力因之确稍杀灭。但统制并不彻底，工商业在相当范围内还很能自由发展。武帝以后除两汉之交有十余年纷乱外，几乎二百多年的统一与和平，交通的发达，货币制度的安定，皆有助于商业的繁荣。两汉的向外发展不仅使域内土地增加了一倍，而且和西域南海的交通日繁，给商业辟了广大的市场，使纪元前后二百年成了国内外商业的黄金时代。在经济统制期间，都市中小规模手工业极为发达，尤以木工、漆业、陶业、装饰品、车船业，及食用具等为著；而纺织业则最显露头角，且集中于临菑襄邑成都三地。官办纺织冶铸工厂每厂用工到二三百人。不过在

乡村中农民的需要则仍依靠相当发达的农村工业。所以汉代可以说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但有几种工业已开始走上资本式生产之路。迨至和帝以后，取消了一部分经济的统制，工商业更加发达，且有再恢复汉初情况的趋势。农工商业的进步使两汉继战国之后，成了一个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不过当时由工商业盈利的人，都喜欢把剩馥的资本购买土地，遂成了兼并者之一，就是这等人间接促成了农村破产，终于使帝国崩溃的。

站在社会上层治理者地位的是官僚。战国年间新兴的士大夫阶级日渐拆毁封建以争求自身的权势。到了秦汉时代，借助系统完密的帝国政治组织与法治主义，乃得建立成十分巩固的地位。上中级官僚享受高爵厚禄与法律政治上的许多特权，如受封国邑，不事徭赋，犯法减罪等。察举制度使他们便于提携宗族乡党，厚俸与权势使他们极容易发财。两汉是一个极端的实利主义时代，一般人民的企望即是作官，作官的目的即是得势与富。汉代全部教育制度即是培养官僚。他们人数虽少，但整个社会与政治都在他们控制中。所谓高级文化也就是这班士大夫阶级的文化。这等人发财以后，大半投资于土地，也成了兼并者之一；兼务工商的为数较少。下级官僚则生活较苦。汉代政治道德比较高尚，但至东汉晚年政风衰溃，贪官暴政使得民不聊生，也是帝国崩溃的主因之一。皇室贵族仍依封建馥制被封为王侯食国邑，但自武帝以后他们都只是“衣食租税”，成了专制政治下一个寄生阶级。表面上社会地位很高，生活很奢侈，法律上有特权，但事实上他们既不能享有政治威权，又不能自由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要想满足野心，仍需作官。所以在两汉社会的构成里，他们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以上所述两汉社会经济的概况，是自封建崩溃后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且给以后二千年中国的社会奠定了基础。汉代在中国